



丝路话语

刘新中/主编

# 大雲寺研究

陈道久 著

大雲寺

大雲寺

陕西旅游出版社

# 大云寺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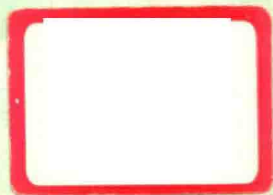
陈道久 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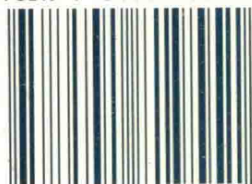
版式设计：阎金祥

照片提供：王昌富

文字校对：兰明珍 罗元博



ISBN 7-5418-1955-7



9 787541 819551 >

ISBN 7-5418-1955-7/G·596

定价：18.50元

# 我所知道的道久

## —为《大云寺研究》序

● 屈超耘

“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的一个初夏上午，道久同志把他的《大云寺研究》送到我的寄寓庄，说是叫我看一看；如若认为有出版价值，可为其写一篇序言。我说写不写序，待我读后再说。他走后，我即把那一堆书稿展现在案间，然后就用心地读起来。读着读着，那缜密的立论、生动的史实和简朴的文字打动了我；我激动了，便情不自禁地对山妻说：“这个道久真是才子，他不单把商州大云寺研究透了，还通过大云寺把武则天研究透了，更通过大云寺和武则天把佛教的一套研究透了。”因为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未等稿子全部看完，我便提前打电话给他：“道久，你叮咛的写序，我一定写，而且很快就会写起。”

读完书稿，我的脑际一直在“过电影”，电影的主角便是它的主人——陈道久。于是那十多年间的往事，一

宗一件尽现脑海。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依然是一个夏天，我奉命去山阳县银花乡去搞社教。临行之前，地区人事局长成传喜对我说：“山阳有个陈道久，是一个颇有才华的人。他虽然只有小学肄业的文化基础，却自学成才，编纂的《山阳县志》很有水平。你去山阳，可以见见他并看看他编的县志。”我到了县上，就托人找他。他来了，一个高挑个儿的中年人，长得有模有样且文文静静。我问了些县上和他个人的情况，他一一作介绍，言辞流畅也表达有度，令人可亲可信。继而我读了他送来的《山阳县志》，编得很有特点，觉得传喜说的不错，从此我便牢牢记住了他。

社教搞了半年多，我返回地区。由于当时地区文管会办公室的领导同志将及退休，我便产生调道久同志继任的想法。我把这想法告诉传喜，他表示全力支持。然而，经与山阳县委联系，对方的答复是：不给，他们那里离不开。前后做了好几次工作，都是无功而返。到了1992年秋，山阳县委书记马仁照同志调地区纪委当头头，传喜和我商量，这是个好机会，我俩便结伴去山阳找老马。老马见我俩笑着说：“现在我不挡了，调他到地区，可以发挥更大作用。”我俩得话，当即便赶到高家沟去找在家休假的道久，那一天，我们可真是费了力气的。高家沟距县城五六里远，那时还不通车路，只有步行。途

中有一条东向西流的河，新雨初晴，河水浑涨，人莫之渡。河上有一座用两根原木架起的桥，又高又软，人在上边，只有小心翼翼地爬行。当我俩冒着危险爬过木桥找到道久时，他却吭吭哧哧，有不愿离家之意。我说：“你这个道久，可真难搬；当年刘备三请诸葛也不过如此，没料到你比诸葛亮还难请。”大概是被我俩的一片诚心所打动，他才和他那漂亮的妻子商量，答应了我们。于是我们很快为他办理了调动手续。

我之所以要用如此长的篇幅来写调动道久的过程，是因为这是我在文化局任职期间选用干部工作值得骄傲的一件事。选用干部，特别是选任业务部门的骨干，必须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选用那些讲政治、能敬业、懂业务、会管理的人。事业单位，重在干事业；有了干事业的人，事业才会有希望。说来叫人高兴，道久同志没有辜负地区领导和我们这些作朋友的厚望。他在方志战线被誉为“拼命三郎”，到文博战线仍保持这种拼命工作精神。在短短的数年间，他和他的战友一道，收回并修复大云寺、城隍庙，创建博物馆，还组建考古队，搞了那么多的考古新发现，有的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有的被“夏商周断代工程”列为学术研究专题，有的填补全国或全省考古空白……，就连那座人们早已忘却而又不起眼的大云寺，他也能研究得如此透澈，宣传得如此红火。记得大概是1996年春，他忽然拿来一个剧

本叫我提意见，这便是后来在省上获奖的商洛花鼓戏《大云寺》，我看后甚是惊讶，我发现他不仅是个颇有造诣的方志工作者和文博工作者，而且也是一位初出茅庐便身手不凡的剧作家。作为兄长和朋友，我当然为他高兴，也义不容辞地担任了这个戏的艺术指导。这个戏的演出，大大提高了大云寺的知名度。

既然是为书写序，虽也应写作者的有关往事，更应该着重于书稿的评说。《大云寺研究》这本书，主要写了商州大云寺的由来以及保护、维修、利用、研究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著者旁征博引，拨冗钩沉，纠正了大云寺创建于明清的舛误，证实它是不折不扣的唐代建筑。更令人击节的是，它由大云寺的研究，牵出了中国唯一一个女皇帝武则天，再现了这位女皇利用宗教文化改朝称制的历史。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既有别于旧史家那样丑化武氏，也有别于新史家那样吹捧武氏；而是通过记述武氏的宗教文化政策和“巫婆”般的统治手段，写出了武氏的多重性。它告诉人们：武则天既不是神，也不是鬼，而是一个人；她既有值得后人歌颂的一面，也有不足为训的一面，她对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利用，自然也有可资借鉴的一面。尤应指出的是，作者在研究大云寺的同时，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研究佛教文化以及历史上佛、道、儒三家相互斗争、相互渗透的历史，读了它，能增长不少知识。还须一提的是这本书的文字表达，

这也体现了作者的功力。他把理论文章写得通俗易懂，把人物写得栩栩如生，把事件写得活灵活现，克服了常见的某些研究性著作中出现的艰涩别嘴，内行嫌单薄、外行看不懂的弊病，让人读将起来似有一种行云流水之感。

岁月匆匆，当年我们把道久调到地区时，他还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一眨眼十年过去了，他已慢慢接近老年了。好在他的精神仍还年青，工作劲头仍不减当年。从这个角度讲，他还在壮年期。壮岁是出成果的最佳龄区。我希望道久抓住有利时机，继续努力，写出更多的好文章、好书来。古人说天道久，地道久；我说人道久，文道久。道久的名字巧合天、地、人合一的说法，加之文道亦久，他可以说是个“四道合一”的“怪物”了。

读罢书稿，立即抚笔，任凭情感流露，不加任何修饰。要说序，也可以；说不是序，亦也可以。到底是什么？我不敢说，大家说它是什么就是什么。

2003年5月31日于商州寄莫庄

（作者系原商洛地区文化局长、著名杂文作家）





## 目 录

---

# 目 录

### 我所知道的道久

——为《大云寺研究》序 ..... 屈超耘 (1)

绪 言 ..... (1)

一 大云寺缘起 ..... (23)

二 商州大云寺 ..... (31)

三 大云经与宝雨经 ..... (43)

四 武则天女皇预言 ..... (55)

五 三教九流排位次 ..... (69)

六 大云寺之佛文化 ..... (85)

结 语 ..... (121)

附录一 商州有座大云寺 ..... (129)

附录二 大云寺导游词 ..... (135)

|     |                   |       |
|-----|-------------------|-------|
| 附录三 | 大云寺剧本 .....       | (155) |
| 附录四 | 商洛博物馆发展构想 .....   | (201) |
| 附录五 | 商州当跻身历史文化名城 ..... | (209) |

## 绪 言

公元1993年，我奉调到商洛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也就是从这时起，我便与大云寺结下不解之缘。

我到职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将这大云寺收归商洛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管理使用，要以大云寺为依托，创建商洛地区博物馆。

当时的大云寺属于军产，由商洛军分区教导队占用。1992年4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将大云寺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军方首长曾答应将大云寺交由当地文物部门保护利用，由于补偿费用、报批手续等问题的协商未果而搁浅，正待有人去催办。

在地委行署的支持下，我同商洛军分区和商洛地区文化局的负责同志一道，进西安、上兰州，很快协商办理了军产移交的报批手续。又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筹集借贷资金80万元，作为征收大云寺的补偿，供商洛军分区新盖教导队训练大楼之用，以便使教导队及早迁出，为大云寺的全面维修创造条件。

大云寺在军队占用期间，既有保护的一面，也有损伤的一面。设想当时如果大云寺不是军队的驻地，而是别的机关或民

居，这座寺院可能早就被瓜分或改建成别的什么建筑了，大云寺也可能早就名存实亡了。幸亏教导队在占用期间，在大云寺院内未进行大的改造性建筑，且长期以来，一直将四座大殿作为会议室、办公室或教室，并增设了砖墙、顶棚，使大云寺各大殿木结构仍然保持着原貌，这就从根本上保护了大云寺。所破坏的只不过是屋面建筑、殿内壁画和佛造像而已。回想“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点儿损伤应该说是算不了什么。

大云寺征收回来了。可它已破败得不成个样子了。它的屋面与普通平房没有什么两样，而且严重漏雨；每逢雨过天晴，外面地皮干了，而屋内的“雨”还在淅淅沥沥滴个不停。由于年久失修，梁架上的木头多半早已糟朽，有些墙皮和柱子已经倾斜，严格地说，它已经成为危房。

寺院的严重破败和军队的长期占用，埋没了大云寺的名气。别说外地人，就是商州城的人，也绝少有人知道这座寺院。甚至住在这个院子的人，都只知教导队或下寺庙，而不知有个大云寺。噫呼哉！曾经红极一时的大云寺竟被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荡涤得无声无息了。

我一接到调令，便立即先去瞻仰我所工作的对象大云寺。那时这院子里有个做蜂窝煤炉子的小厂，生产甚不景气，环境颇显凄凉。院中荒草离离，污水团团；殿内鼠矢点点，蛛丝斑斑。所有厢房被五六个单位和十数户职工家属挤得严严实实，临时搭建的厨房、柴棚横七竖八，露天茅厕竟有一二十个。三门前被一名残疾人占去开办了一个小饭店，烧饭炒菜，烟熏火燎，竟把天王殿两根木柱烤焦了大半。尽管如此，而我第一次到大云寺，便对

它产生浓厚的兴趣。

最先使我感兴趣的是大殿东西山墙上的砖，那每块砖上都有阴印“大云寺”三字，字体楷书，一律自右向左横排，显然是在做砖时用模具压制成字的。制字的目的无非是要告诉人们：这些砖都是修建大云寺的“专用砖”，这种专用砖是不能挪作别用的。

我在一个墙拐角里发现了块完整的字砖，顺手又拾了个塑料袋把它装起来，拿到招待所（我的临时办公地）洗了洗，磨了磨，并同当代烧制



的青砖比了比，发现这种字砖比当代烧制的砖质量要好，它不像用生土烧制的，而是用熟泥烧制的。

透过这块特制的砖，我似乎觉得这大云寺应该有一段特别风光的历史，于是我便开始关注它的起根发苗和来龙去脉。

我查阅了一些史书、志书和关于佛教的书，终于发现：早在一千三百年前，天下的大云寺很多很多，而且极其风光，只是风光的时间不那么长便都销声匿迹或灰飞烟灭，唯商州这座大云寺被改头换面和改名换姓而幸存下来。它所以能够恢复大云寺名，完全得益于大殿山墙上的砖，是它深深刻着的“大云寺”三字，不仅使大云寺得以正名，而且使大云寺名传千古。

我携着砖和资料，向主管我的商洛地区文化局局长屈超耘先生汇报了我的看法，并请求他写篇文章，宣传一下大云寺。他看后非常兴奋，很快写了篇《商州有座大云寺》的文章，在省级报

刊上发表。这位屈先生不仅是个官，更是个文化人，他的杂文在省内外很有名气，所以他写的这篇文章对大云寺的宣传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也有人对屈先生这篇文章的观点提出过质疑，质疑的焦点是商州这座大云寺不可能建于唐代，而是建于明清，甚至说建于清顺治十八年，他们的理由追究起来只有一条：唐代的古建筑不可能保留到现在。

学术上的争议本来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可有时也会产生出不正常的后果。1994年，地区文化局申请立项维修大云寺、创建博物馆的报告被行署专员办公会否决，否决的主要理由是：维修清代的破庙有没有必要？

商州大云寺到底是什么时候兴建的，它是干什么用的，维修它还有什么意义？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作为一个管理大云寺的文物工作者，应当有义务有责任去回答这些问题。于是乎，我便开始对大云寺作进一步地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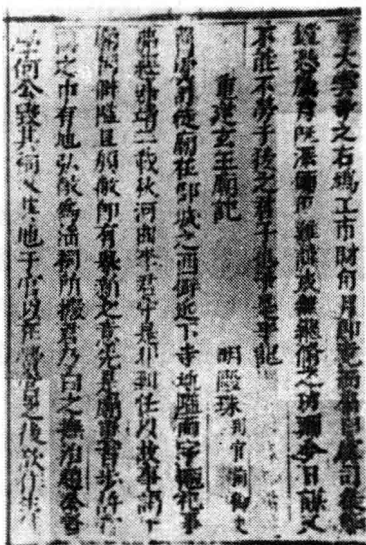
### (一)

首先要研究清楚的是大云寺的创建年代。这不仅关系着大云寺的维修规划和维修方案的制订与实施，而且关系着我们文物工作者对待历史 and 对待文物能否求是存真的态度。如果它不是唐代创建的，我们硬说它创建于唐代，借以抬高它的地位，显然是欺世盗名，以假乱真的错误态度；如果它是唐代创建的，却因我们不通史识，误把修葺视为创建，因而降低它的价值，那也是一种以讹传讹、不负责任的错误态度；如果是因为原来申报的是明代建筑，现在即使有资料证实它是唐代建筑也宁肯贬低它的历史价

值，也要固执己见，将错就错，无疑是一种败家子思想。这几种思想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要的是认真的、负责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态度。

大云寺在申报省级文保单位时，被认为是明代的建筑，主要依据是文物普查登记时大殿木结构受损程度的推断。有明一代，近三百年，大云寺应有修葺，这种推断是有些道理的。但有明代的木结构并不等于就是明代的创建物，犹如我们最近的维修，把三门的木结构全部换成了新的，并不等于说三门就是最近创建的。考诸明史，未见有创修大云寺的记载，所以说，商州大云寺创建于明代的论断，根据是不足的。

也有人说，大云寺新建于清顺治十八年，根据是一位健在的老人之回忆，这种回忆似乎是不可靠的。顺治十八年即公元1661年，至今三百多年了，这位老人虽已年逾古稀，却怎能回忆得起他出生前二百多年的事呢？明代末年，李自成农民军占据商洛，官府屡派重兵围剿，兵燹和大荒，致使农田多废，斗米银价二两，流离者十之八九，有的县城阅岁绝人踪，茂草深数尺。至清顺治间，商州（含今商州全部及丹凤县大部）户口由万历时的三万余户降至三千多户。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官府还是民间，筹集巨资新建大云寺，似乎是不可为或不可能的。何况当时的文献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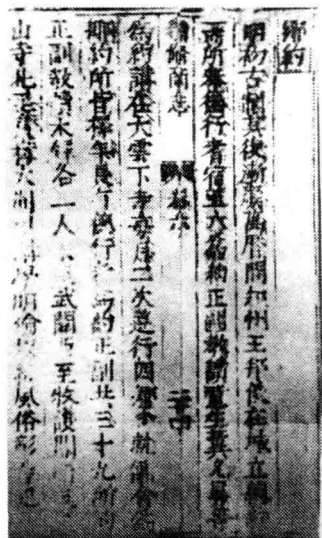




有多处关于大云寺的记载了。

一处见于清初的《大清一统志》。志云：“大云寺在州治西，寺内石佛一尊。唐建，旧名西岩院，元至正中更今名。”另一处见于康熙四年（公元1665）编纂的《续修商志》，它是这样记载的：“大云寺，旧名西岩院，在西门里，幽敞清静，不愧名刹。中有石佛一尊，系唐开元十八年陪戎副尉、守武关戍主，上柱国开国公孙阎敬询，并新任守武关戍主、上柱国萧元昶造。”还有

两处见于明代制作的两块碑文：一块是制于正德年间的《虞司徒庙记》，文中记述着商族始祖契佐大禹治水有功，虞舜封之司徒，封地在今商州；故州守候君“遂卜地于大云寺之右，鸠工市财，旬月即竟，而匾曰‘虞司徒庙’”等经过。另一块是制于嘉靖间《重建玄王庙记》，文中记述有“旧虞司徒庙，在郡治之西，僻近下寺，地陋宇陋，纪事不经”，且“为淫祠所据”；故而择地重建，并据“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意，易名“玄王庙”。此外，《陕西通志》



还记有明万历间，商州知州王邦俊沿习乡约古制，“在城立总约一所，举德行耆旧五人为约正副教读”，“在大云寺下寺，每月二次”，“讲学明论，以维风俗”的故事。

以上诸多文献，记载虽不尽一致，但有一点则是共同的，可信的：即在明以前，商州大云寺一直很有名气，这座大云寺就在商州城西。寺里还有一尊唐开元十八年由阎敬询和萧元昶捐造的石佛